

# 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内在机理与行动路径

李月, 刘义兵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 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产业韧性强”, 具体表征为产业适应力强、产业变革力强、产业竞争力强与产业发展力强。农民教育有助于通过培育产业适应力、变革力、竞争力与发展力而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当前农民教育面临教育体系前瞻性不足制约产业生计韧性生成、教育主体“专家-依附”行为阻碍产业复元韧性锻造、教育活动乡土“祛魅”约束产业功能韧性拓展、教育平台支撑不力阻滞产业过程韧性提升的行动挑战。基于此, 应增强农民教育体系前瞻性、加大韧性导向的农民教育制度设计与资源供给, 促进农民教育主体观念调适、践行专家系统与农民教育系统并重下的协同发力策略, 推动农民教育活动“在地化”连结、转化乡村价值体系, 完善农民教育平台多元定位、拓展乡村产业主体“后天建构性”关系网络, 以支撑乡村产业韧性水平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 农民教育; 乡村产业; 韧性; 农业强国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3)03-0054-11

## Enhancement of the rural industry resilience empowered by farmer education:

### Internal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LI Yue, LIU Yib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t sign of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e is to have strong industrial resilienc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industrial adaptability, transformative abi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Farmer education helps empower rural industries to enhance their resilience by cultivating their adaptability, transformative abi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Currently, farmer edu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insufficient foresigh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constraining the generation of industry livelihood resilience, the ‘expert-attachment’ behavior of education subjects hindering the forging of industrial recovery resilience, the disenchantment of local educational activists restrict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industrial functional resilience and the weak support of the educational platforms imped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process resilience. Hence, it is of necessity to enhance the foresight of farmer education system increase the design and resource supply of the resilience oriented farmer education system, promote adjusting the subject concept of farmer education, implement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y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expert system and farmer education system, promote the localized connection of farmer education activities, transform the rural value system,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the positioning of farmer education system and expand the ‘acquire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rural industrial subjects to support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resilience.

**Keyword:** farmer education; rural industry; resilience; a strong agriculture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正式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体系, 提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首要工作是要准确把握其本质特征与内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收稿日期: 2023-03-12

基金项目: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重庆研究院 2022 年战略咨询研究项目 (2022-CQ-YB-6)

作者简介: 李月 (1993-), 女, 四川广安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成人教育。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正式将建成农业强国的本质特征明确概括为“五强”，其中之一就是要确保“产业韧性强”。“产业韧性强”既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风险明显增多的全球外部环境，端牢中国粮“饭碗”、把牢发展主动权、筑牢国家安全防御体系的前瞻性思考；也是应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不稳、贸易摩擦加剧、农业国际合作受阻<sup>[1]</sup>等多重压力，全方位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匹配的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的系统性谋划；更是立足国情农情对我国农业产业当前应对风险冲击的综合能力还比较弱<sup>[2]</sup>这一现实问题做出的积极回应与战略布局。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早于2021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增强产业韧性和抗冲击能力”<sup>[3]</sup>，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sup>[4]</sup>，旨在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的安全水平，使其能在充满各种风险挑战与不利因素的复杂形势下“稳得住、起得来、有效益和可持续”，并最终推动“以自己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以自己的供给满足自己的需求”<sup>[5]</sup>的农业强国建设。

培育乡村产业韧性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乡村产业韧性培育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科学内涵、现实表征、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韧性”（resilience）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受到外力作用后恢复到原来的状态<sup>[6]</sup>。后经多学科领域推演转换后，逐步衍生出生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心理韧性以及乡村韧性等多维概念。乡村产业韧性是韧性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的概念拓展，也是农业强国视域下乡村韧性在农业产业层面的精确演绎。研究者大多对“产业韧性”做出了“能力说”的诠释，即普遍认为产业韧性“是一种能力，而非结果”<sup>[7]</sup>，并将其界定为农业产业系统“吸收干扰并保持基本相同的结构、功能与特质的能力”<sup>[8]</sup>“维持自身稳定状态，并能够迅速从冲击中恢复、调整及转型的能力”<sup>[9]</sup>，具体表征为“恢复力、组织力、适应力”<sup>[10]</sup>“创新力、持久力、竞争力、适应力”<sup>[11]</sup>等关键能力。而韧性又是在不同层次与尺度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系统的韧性体系往往由多个维度的韧性构成，并同时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如有

学者将乡村产业系统的韧性细分为农业产业链韧性<sup>[12]</sup>、农业经济韧性<sup>[13]</sup>、粮食体系韧性<sup>[14]</sup>等维度，并着重探讨了“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关系网络”<sup>[15]</sup>，以及“人口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与财政投入、社会资本与地方知识”<sup>[16]</sup>等对乡村产业韧性提升锻造的影响。而旨在增强乡村产业韧性的主要优化路径则包括“改变传统耕种方式、健全土地制度、运用地方知识、建立社会网络”<sup>[17]</sup>，以及“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附加值、探索多样化的生计渠道、提供新技术扩散所需的教育培训”<sup>[18]</sup>等等。

综合来看，虽然有关乡村产业韧性的探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多聚焦乡村产业系统内部探讨产业韧性提升问题，“就产业论产业”特征明显，无法反映乡村产业韧性生成问题全貌；侧重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乡村产业韧性提升与锻造的影响，而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方面有所忽视。韧性建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人”的作用<sup>[19]</sup>，对人开展“软技能”教育培训是保证乡村产业实现可持续与韧性发展的必要前提<sup>[20]</sup>。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教育开启了处理与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sup>[21]</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教育、知识和学习视为人类应对未来挑战、开启新道路的重要资源<sup>[22]</sup>。为此，笔者拟超越产业系统边界与现有研究范畴，聚焦在对主导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的“人”的教育赋能上，从与乡村产业主体关联最为紧密的农民教育视角出发探索提升乡村产业韧性的更加积极、多元的策略方案，进而推动建设“产业韧性强”的农业强国。

## 二、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的内在机理

所谓农民教育，本文主要针对涉农产业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的家庭农场主、专业种养加能手、农业经理人等乡村产业主体开展的，以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大局为目标、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导向、以提升乡村产业人才整体素质为抓手的一切系统性教育与培训工作。基于前人研究，本文将乡村产业韧性界定为：乡村产业抵御风险冲击、适应风险冲击、在风险冲击中进化变革并最终实现“反弹”、回归产业发展应然状态

或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理想路径”的能力，重点表征为适应力、变革力、竞争力、发展力四种核心能力。一个易受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的乡村产业只有不断主动适应、顺势变革、积极再造与持续发展，方能在充满各种风险挑战与变革冲击的农业强国建设进路中真正实现“稳得住、起得来、有效益与可持续”的韧性发展。同时，遵循已有研究有关韧性维度的划分逻辑，本文将乡村产业韧性细化为以维持基本生存与发展目标为导向的生计韧性、以复原革新为价值取向的复元韧性、以抗风险能力提升为前进方向的功能韧性和以可持续风险应对格局塑造为行动旨归的过程韧性四个维度。乡村产业韧性的四个维度层层递进，共同推进乡村产业韧性的螺旋式生成、提升与锻造。

乡村产业是典型的风险产业，因为其生存发展总是与充满威胁挑战的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为此，乡村产业韧性培育本质上就是一个以教育手段

提升其自身有效规避、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与变革冲击综合能力的过程。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以农民教育适配性改造及推动形塑群策群力的教育生态而支撑乡村产业适应力培育，从而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冲击，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目标；以促进知识传输与技术扩散而支撑乡村产业变革力培育，从而以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对原有发展路径进行革新<sup>[7]</sup>，实现较快自我复原、形成以风险冲击为契机或起点的新稳定状态；以“在地化”连结、转化乡村价值体系而支撑乡村产业竞争力培育，从而拥有较高的生命力、创新性与行动可能性，获得更为理想的经济效益，表现出更为强大的功能韧性；以推动交互平台创建、关系网络搭建而支撑乡村产业发展力培育，从而有助于风险应对格局的长期有效构建，使乡村产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具备持续“反应”与动态稳定的过程韧性。具体理论框架和内在机理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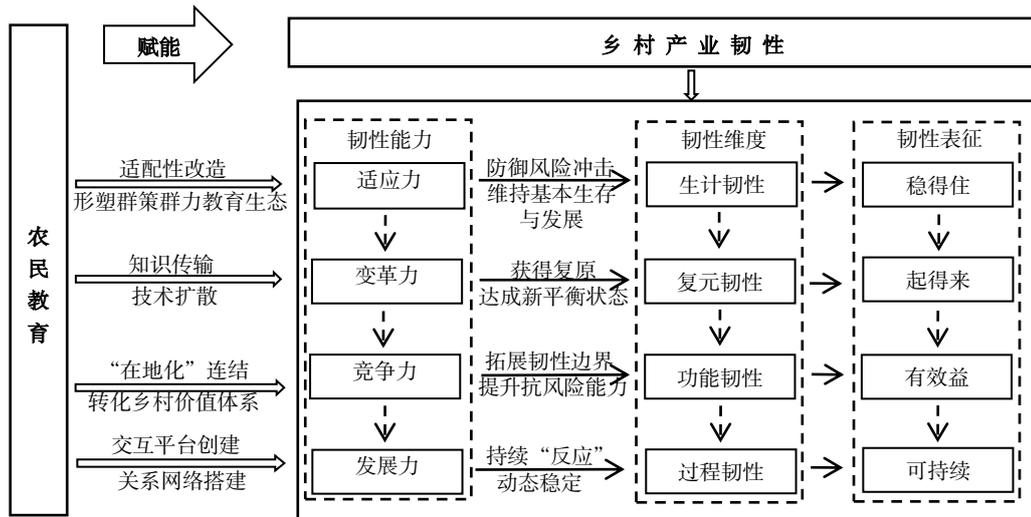


图1 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内在机理

(一) 适应力培育：赋能乡村产业生计韧性提升的重要基石

“适应”是指自然或人类系统为应对外部冲击而采取的减少脆弱性的行为与举措。根据生物学的观点，一个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存续的系统，其首要特征是该系统本身的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相适应<sup>[23]</sup>，甚至需要具备比外部环境更高的复杂性，方能对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做出有效预判、预警与预防，进而做到有效抵御、缓冲或化解风险，达成以维持内部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稳定、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目标为导向的生计韧性生成。我国乡村产业大多基础薄弱、生计脆弱性明

显，要提升产业生计韧性，根本前提在于增强产业自身适应力，使其能在充满各种风险挑战与不确定性变革的环境中，通过主动采取与国家战略规划、地方发展前景、市场竞争规律、技术前进方向、消费群体需求以及自身资源禀赋等高度适切的劳动与生产行为，而防范、抵御或削弱诸如政策变化、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带来的风险侵袭与扰动，进而实现以“产业适应力强”为首要表征的“产业韧性强”的农业强国格局架构。但同时“适应”也是一种动态交互作用的过程<sup>[24]</sup>，其意味着乡村产业要迈向更深层次、更高阶段与更具韧性的演变和发展，除其自身主动适应外，外部环境也必须通过推

进物质、信息、能量等各种资源与生产要素向产业集聚的方式，来支撑其适应性行为的持续生成与涌现，保障复杂形势下乡村产业的平稳运行，实现以生产力的稳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的韧性发展目标，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赢得战略主动权。

由此来看，产业适应力可以被理解为乡村产业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内在能力与外部环境支撑匹配产业韧性发展的能力<sup>[25]</sup>。产业适应力提升则可以被视为内外部力量相互交织作用的新内生发展结果，既强调产业自身的主动适应，也主张外部力量的积极干预、帮扶与赋权等。而农民教育作为与乡村产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具有驱动乡村产业适应力提升的天然优势与可行性。其作用机制一方面在于根据乡村产业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主动适应与自我调适需要，切实推进自身政策制度体系、教育行动框架、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课程内容结构等的适配性改造，通过与国家长短期战略规划达成高度一致、与市场运行需求达成自适应调整、与产业升级前进方向达成良性适配等方式，赋予乡村产业主动吸纳、规避或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提升其生计韧性；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形塑政校企研等多元主体群策群力的教育生态与助推体系，而有力支撑起乡村产业适应力的理想生成与锻造，使乡村产业在政府的制度设计与财政支持、院校的课程建设与师资引领、企业的技术支持与平台支撑以及社会的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下，获得有助于支撑自身主动适应与自我调适行为的物质、信息与能量，并以此增强自身风险防御水平与抵抗能力。

## （二）变革力培育：赋能乡村产业复元韧性提升的根本动力

尽管适应力培育有助于防范化解冲击，使农业强国建设有充足底气与战略主动性，但加快“产业韧性强”的农业强国建设，其根本动力还在推动农业产业不断创新升级、培育其变革力。变革力是指乡村产业以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等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行为路径等进行革新的能力。具有良好变革力意味着当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冲击发生时，乡村产业能根据自身目的或所处环境变化，及时进行自我功能重建与结构转型升级，以有效应对风险冲击，同时为可能到来的新的风险冲击做好准

备。变革力培育有助于赋予我国农业产业“持续革新”与“动态进化”的生命力，使其在遭受风险冲击时能较快获得恢复或达成新的稳定状态，并推动实现以风险冲击为契机起点、以复原革新为价值取向的复元韧性生成。由此，作为乡村产业成功蜕变的结果，复元韧性是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的复杂境遇下支撑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实现由大向强、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一产向二产三产延伸融合等转变的关键前提，其生成锻造较大程度上有赖于产业自身“由内而外”的本质变化，强调乡村产业内生发展潜力的有效激发与自我复原能力的大幅提升。

农民教育可以通过推动知识传输与技术扩散等旨在改变产业发展原有知识轨迹、打破产业发展现存技术界限的方式来促进乡村产业复元韧性的理想生成与锻造。其深层次逻辑在于，各类风险挑战倒逼乡村产业以新业态、新模式等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行为路径进行转型升级和优化革新，而作为与乡村产业业态升级与模式革新密切关联的现代性生产要素，即乡村产业主体所具备的知识、技术等人力资本，其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优化革新的结果好坏，进而决定了风险冲击发生后乡村产业获得自我复原、形成新稳态的成效优劣。其作用机制在于，农民教育通过开展专项知识与实用技术培训、组织农民实地参访考察以及提供送教下乡、带技入户与定点帮扶等教育服务的方式，推动农业产业新兴理念、前沿知识、先进技术、创新工艺等实现从农技研发者、推广者以及教育服务者向乡村产业劳动者转移，并最终经由乡村产业劳动者凝结、应用在乡村产业生产、经营与管理范式革新与路径优化一线，使乡村产业在遭遇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时能较快获得“起得来”的韧性发展。

## （三）竞争力培育：赋能乡村产业功能韧性提升的有力抓手

变革力培育有助于风险侵袭扰动下产业较快实现自我复原或达成新的稳定状态，但却不能完全保证产业因此获得更高层次的韧性水平。有研究指出，产业韧性与产业竞争力呈正相关，产业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大小均主要由产业竞争力决定<sup>[26]</sup>，产业竞争力提升意味着产业韧性边界的拓展，即拥有较高竞争力水平的乡村产业表明其更有能力抵御更

加复杂、更高强度的风险冲击,更有可能在风险冲击中获得较快恢复,并表现出更为持久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更高质量、更具效益的功能韧性,确保不因依赖其他国家农产品供给而损害农业产业自主独立性,不因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外资竞争冲击而影响农产品供给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sup>[27]</sup>;也可以有效避免因农资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流转租金上提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sup>[28]</sup>。而理论上普遍认为,产业竞争力多“通过乡村多种产业的此消彼长与竞相发展来体现和表达”<sup>[29]</sup>,提高乡村产业竞争力应充分发挥乡村产业的区位优势与比较优势,实现本土资源的最大化价值与效用,同时基于“在地化”乡村价值体系进行开发与创造,使乡村产业“源于特殊性从而也创造着特殊性”<sup>[30]</sup>,并最终推动实现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特色化与品牌化。故此,要提高乡村产业竞争力并以此拓宽市场空间、提升收益水平,需建立在乡村整体价值基础上并与乡村价值体系相结合才具有可能性<sup>[31]</sup>,旨在通过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融入地方特色元素、厚植本土文化根基、回嵌乡土生产观念等创新转化乡村价值体系的方式,有效避免乡村产业因无差异重复建设、低水平同质竞争等带来的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进而保证产业有效益、农民有收益的真正实现。

农民教育有利于将这一理论思考落实到实践操作层面。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农民教育多是遵循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部署到基层,基层政府结合地方实际进行承接与贯彻执行的“项目发包式”逻辑推进,如近年实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等,其本身所倡导践行的田间课堂、实地参访与现场示范等教学形式,以及所具备的“地方性”“本土性”与“弹性”等教育属性,对特定范围内乡村价值体系具有更强的“在地化”连结功能,能有针对性地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历史、社会、生态等多元价值因子因地制宜地嵌入、融合到地方农民教育与培训实践中,使区域乡村要素禀赋不断被形塑、改造与重组,并源源不断地创生出新的意义形态与价值空间,进而以此激活乡村产业的文化想象、提升

乡村产业的独特蕴涵,同时增强乡村产业的自信心、吸引力与附加值,使其在与外部环境的接壤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经久不衰的强大竞争力。为此,提升乡村产业韧性,亟需增强农民教育与乡村价值体系的连结深度,旨在通过推动农民教育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的内容框架基础上主动嵌入、紧密融合乡村多元价值的方式,而有力支撑起乡村产业特色发展、错位竞争与功能韧性提升需要,使其在复杂多变形势下仍能获得持续收益。

#### (四) 发展力培育:赋能乡村产业过程韧性提升的关键举措

产业韧性获得后,同时也要维系韧性的可持续性。乡村产业韧性的生成锻造需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事实上,从农业强国建设的长周期来看,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不确定性风险因素都是不可避免的,乡村产业发展要面对的不仅是短期突变的不利因素损害或威胁,更需应对长期渐变、交织重叠的综合性、弥漫性风险的侵袭扰动。所以乡村产业韧性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对特定风险做出“应激”反应、采取“即时”行动的能力,还是为应对某一阶段或较长时间内的风险冲击做出“持续反应”、采取系列行动的动态稳定过程。由此来看,韧性内含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可持续性<sup>[32]</sup>,即要求乡村产业形成长效、持久的风险应对格局,具备在外部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的复杂形势下保持长期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韧性。而乡村产业过程韧性生成锻造的根本之策需回归乡村产业本身,从产业内部寻找突破点,旨在通过培育产业自身发展力而增强其长周期应对风险冲击的“持续反应”能力,以及“为后续三步、五步乃至全局的态势提供足够支撑”<sup>[33]</sup>的可行能力。其深刻要义在于,只有乡村产业自身具备发展力,才能在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走向风险防范及应对的自主与自觉,并最终推动实现乡村产业过程韧性的整体提升与锻造。

产业发展力培育强调扎根产业,以乡村产业主体常态化的交互学习为主,又强调与各个群体、各方力量相互连结,通过搭建“上下、内外”联动的关系网络来获得更加积极、坚实的支撑力量。农民教育作为一种以公益、开放和共享为核心价值向度的教育,恰具支撑乡村产业主体交互学习与关系网

络拓展延伸的平台优势。具体而言，一方面，相关农民教育培训项目的部署实施将大量来自不同产业的乡村劳动力集聚于同一空间，使产业主体间双向、平等、对称的交互平台得以创建，而因农民教育交互平台创建形成的“关系网络”，则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主体实现群体互助与团体凝聚，使其相互间在参育参培结束后仍能通过保持“惯常联系”、开展“圈层化”学习以及结成风险应对共同体的方式，形塑知识互享、技术互补、信息互通、经验互鉴以及资源互助的紧密联系格局，确保乡村产业在遭遇动态变化的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时，能及时获得有效解决办法与应对经验，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韧性。另一方面，除了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主体间群体互助与凝聚，农民教育交互平台的搭建也能为乡村产业主体与政社校企研等多元行动者之间创生新的交互连结、创造更为丰富宽泛的“关系网络”提供现实基础，使乡村产业主体有机会和条件通过运用该关系网络，分享来自政社校企研等多元行动者的信息、资源、技术、服务等社会资本与生产要素，提升与锻造自身产业发展能力，实现产业过程韧性可持续生成目标。

### 三、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的行动挑战

（一）教育体系的前瞻性不足弊端：制约了以风险意识及认知培育为基础的产业生计韧性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sup>[34]</sup>。农业强国视域下“产业韧性强”的首要标志在于不稳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下农业产业发展能做到稳字当头、稳中有进，以“确保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sup>[35]</sup>，真正依靠自己力量端牢中国粮饭碗。适应力培育是着眼于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风险冲击的前瞻性应对，有助于通过保障产业系统内部形态结构与生理机能稳定而架设安全可靠的产业发展格局与风险防御体系。但适应力培育并非易事，不仅需要乡村产业主体具备对产业发展、演变及其趋势的前瞻性视野，更需要对产业发展趋势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与未知后果形成系统认知，通过采取与国家战略、区域规划、市场条件、社会需求等相适应的产业发展决

策与行为，规避、防范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然而现实中多数产业主体存在被动适应乡级政府干预决策、村级干部推动举措以及盲目非理性跟风等行为，如人民日报曾报道的贵州某地因政府补贴提升或看到其他人“尝到甜头”而跟风种植火龙果却遭遇价格下挫事件<sup>[36]</sup>，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产业主体前瞻性培育及其风险意识与认知教育还存在短板与不足。具体表现在：风险意识及认知教育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中占比较小且内容浅显，大多仅限于乡村产业主体自然风险防控意识激发层面，而对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与变革冲击内容涉及明显不足，由此造成乡村产业主体难以通过准确预见与科学觉察而真正实现风险规避。再加上当前农民教育在瞄准国家战略、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前进方向等方面还存在不全面、不同步甚至“脱节”等虚化悬浮现象，导致大多乡村产业主体对国家政策理解不透彻、对市场供求关系认识不科学、对区域产业结构布局不了解、对外界风险冲击信号不敏感，削弱了乡村产业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并衍生出产业培育难、产业项目失败率高、风险频度大以及“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生计韧性不足业态。另外，乡村产业生计韧性的提升锻造也需从外部环境中获得支撑自身适应性行为持续生成的能量资源，然而当前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农民教育顶层设计则更强调以相对健全的教育资源供给、制度建设与政策架构等来推动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而对以维持产业内部形态结构与生理机能稳定为目标导向的适应力培育工作却有所忽视，使产业适应力培育所需的物质、能量与资源等处于相对匮乏状态，这对乡村产业风险的早期识别与防控工作同样十分不利，乡村产业生计韧性的提升锻造面临外部驱动力不足的严峻挑战。

（二）教育主体的“专家-依附”行为：阻碍了以“教育-赋能”路径为本源的产业复元韧性锻造

囿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与高风险性，在充满各种风险挑战与矛盾冲突的复杂境遇中，只有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复元韧性的有效生成与锻造，农业强国建设之路方能行稳而致远。但乡村产业复元韧性的生成并非一个自然呈现的过程，而是针对风险冲击顺势展开的以产业变革力培育为抓手、以新稳定形态达成为导向的科学应对过程。产业变革力培

育的关键取决于同时作为教育主体的乡村产业主体在自身产业遭遇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时是否具有推动产业发展范式革新与行为路径创新的专业性知识与技术,以确保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下乡村产业变革创新取得效果、复元韧性锻造获得理想成就。但现实是当前大多乡村产业主体的涉农知识和技术相对零散,系统性不强、专业性不高,在推动乡村产业实现由变革力培育而生成复元韧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而造成这一现实处境的原因,除乡村产业主体自身非农专业出身、学历层次较低、能力水平有限、跨界跨域发展等因素影响外,更关键的症结之一还在目前乡村产业主体普遍将能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咨询等服务的具备专门化与专业性知识的专家系统<sup>[37]</sup>,视为有效应对风险冲击的首要选择与惯性依附对象,而旨在推动其自身专业知识习得与技能养成的农民教育与培训,却逐渐沦为乡村产业主体谋求政策福利、获得项目倾斜、拓展业务渠道等的逐利“阶梯”与工具。由此长期量变导致的结果是,使多元冲击与变革压力下的乡村产业复原革新方式严重偏离“教育-赋能”的内生式发展路径而转向迈入“专家-依附”的外源式发展轨道,并长期处于“依赖性的发展知识和被他人叙述的发展知识之中”<sup>[38]</sup>。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可以为乡村产业的复原革新带来知识与技术上的支持,进而确保有效应对、化解冲击,但从长远来看,乡村产业主体这种“强专家系统、弱教育系统”下的惯性依附行为很难推动乡村产业复元韧性的真正生成与锻造,相反却容易因专家系统“责任淡漠、知识局限性”<sup>[22]</sup>“追求经济利益、权力或地位,以及专家系统与产业主体之间不平等的信任关系”等<sup>[39,40]</sup>,而使乡村产业的发展变革陷入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境遇中。此外,乡村产业主体对专家系统的惯性依附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民教育生态,遮蔽了农民教育在乡村产业变革力培育过程中本应发挥的知识传输与技术扩散的功能价值与效用,进而导致其对乡村产业复元韧性生成锻造的“支持低效”,制约了乡村产业业态升级、模式创新等的高层次跃迁步伐。

### (三) 教育活动的乡土“祛魅”现象:约束了以乡村价值体系为依托的产业功能韧性拓展

农业强国致力于建设更具竞争力的乡村产业。乡村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韧性相辅相成、一体相促,

提升产业竞争力有助于应对风险冲击、抵御不利因素损害或威胁<sup>[27]</sup>。乡村价值体系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应架构基于各地价值体系的产业发展格局。当下,乡村产业竞争力培育存在一个严重误区,就是看不到乡村价值<sup>[29]</sup>,存在对乡村价值体系的“锁闭”“偏离”现象、面临乡土性“褪色”“失活”的潜在挑战,因而乡村产业无法利用地方资源禀赋进行创新,影响了产业功能韧性的拓展。现代化背景下,在农民教育的整体框架下,能迅速便捷带来经济效益的科学知识和现代技术更加受到重视,乡村生产功能与生活理念等传统资源禀赋则缺乏应有的意义空间。在农民教育教学实践中,“山水林田湖草沙,乃至冰天雪地、稻田里的萤火虫、天空中的星星以及傍晚的一抹夕阳等新的生产资源”<sup>[41]</sup>没有被视为一股具有潜在市场价值与经济效益的优势力量予以关照;民间信仰、风俗传统、历史记忆等乡村特色文化基因仅被作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参照补充而点缀其中;乡土文化、地方知识、农耕技艺等现代产业创新要素在农民教育实践的价值序列中也尚未得到应有重视。乡村价值体系在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为核心目标的农民教育系列实践与活动中遭遇了整体“贬值”与“祛魅”,由此不仅截断了乡村产业与乡土社会的亲熟关系,使乡村产业越来越脱离当地特定的社会结构、独有的文化属性以及鲜活的生态系统,同时也潜在地将“本土”消解、转换成了一套无深层次意象及内涵的“坐标系”,使乡村产业因缺乏对本土价值体系现代意义的肯定性体认而导致创新乏力,进而造成产业发展的高度格式化、同质化与单一化,长此以往将面临失去市场竞争优势的潜在风险,削弱乡村产业发展的综合效益。

### (四) 教育平台的支撑不力短板:阻滞了以“后天建构性”关系网络为载体的产业过程韧性提升

受内外部环境变化干扰,我国农业产业风险仍在持续积累和暴露,过程韧性的理想生成与锻造是赋予乡村产业成功应对风险、助推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保障。而建立并维系一个“连接紧密、来往频繁且彼此信任”的上下、内外关系网络则是赋能乡村产业过程韧性提升的关键,其可以通过推动“知识技术的交汇融合、信息资源的叠加整合以及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等<sup>[15]</sup>,而使乡村产业在遭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时

能最大限度保持化解应对的及时性、灵活性与有效性。然而，目前乡村产业主体普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自然形成的“先赋性关系网络”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其所具备的“强连带”、群体同质及信息“茧房”等属性，使乡村产业主体在面临风险冲击时，难以通过形成理想的知识互通、经验互鉴、能力互补以及资源互惠的共同发力状态，来实现对乡村产业发展力培育的强力支撑以及过程韧性生成的可持续“赋能”。而基于农民教育“空间集聚效应”架构形成的交互平台则有助于支撑乡村产业主体的关系网络实现从先赋性关系向以学缘、趣缘、业缘等为纽带的后天建构性关系拓展<sup>[42]</sup>，且在此关系网络中，多个拥有异质性知识、洞见与经验的“弱耦合”圈子并存，能有效缓解“先赋性关系网络”的资源禀赋困境，更好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力培育及过程韧性生成的多元需要。但现实是，相关农民教育培训却通常表现为单一的教育教学平台，而尚未承担起理应同时作为撬动产业发展社会资本、强化产业内外广泛“黏性”、密切政社校企研等的多边联系，以及推动成员关系补偿效应与辐射带动作用发挥的交互性平台、服务性平台、资源再组织平台、要素互渗透平台、技术共创平台等的多重角色与功能，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乡村产业主体后天建构性关系的拓展广度与深度，使其与政社校企研等多元关系主体间表现为一种松散、悬浮的弱连接状态，不仅在相关教育培训开展过程中缺少实质性的互动联系，培训结束时也普遍呈现出“线断、网破、人散”局面。进而时常引发的不良后果是，在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下，政府部门无法及时传达风险防范及应对的信息指令，涉农院校难以承担短时间内将知识、技术、资源与服务等高效传输、扩散到产业生产经营与管理一线的主要作用，乡村产业主体较难获得专家同行的持续跟踪指导和帮扶，社会组织也无法顺利完成对乡村产业发展力培育的其他形式“赋能”等等，制约了产业过程韧性的可持续生成与提升。

#### 四、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的行动路径

##### （一）关切适应力：增强教育体系前瞻性以赋能乡村产业生计韧性有效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民种什么、养什

么，要跟着市场走，而不是跟着政府走”<sup>[43]</sup>。这就要求着力破解过去农业产业“政府让种什么就种什么”“干部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被动适应问题，发挥农民教育在提升产业主动适应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因为相较于花费更大成本解决已经发生的风险问题，乡村产业自身具备“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风险防范意识，采取诸如“积极了解国家政策导向、科学预判市场走向并及时调整经营管理思路与策略”的主动适应行为，有意识地利用“购买农业保险、签订价格合同、适度规模种植、开发新的流通渠道”等手段，削弱风险冲击发生的概率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对促成产业生计韧性的有效生成更为关键。农民教育要加大对乡村产业主体风险防范意识与认知的培育力度，一是应增强农民教育体系包容性，将风险意识及认知教育视为赋能乡村产业生计韧性提升的有力抓手，置于农民教育体系的重要范畴与突出位置。不仅系统增设专题模块、专栏讲座与专项培育行动，指导乡村产业主体制定日常“风险识别、防控与应急应对清单”，以从防灾减灾控灾层面着手达成提升产业生计韧性目标；还要将风险意识及认知教育融进相关涉农法律法规普及、政策宣传、良种推广、技术扩散等农民教育与培训内容中，以消除乡村产业主体因缺乏合理教育通道而造成的风险意识不足、认知匮乏等障碍，提升其及时发现、主动规避风险挑战的综合能力。二是应增强农民教育体系前瞻性，通过推动农民教育方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紧密对接、农民教育目标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农民教育设计与地方资源禀赋相互匹配、农民教育内容与风险冲击防范有效关联的方式，赋能乡村产业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内在能力，使其在深刻意识并认知风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掌握风险预防主动权，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sup>[44]</sup>的同时，能通过采取科学甄别发展方向、认真选择发展项目、合理规划发展布局以及动态调整发展模式的主动调适行为，形成与当地政策环境、产业结构、市场规律、消费者需求等高度适配的发展格局，锻造出强大的生计韧性。另外，乡村产业生计韧性的锻造也有赖于制度的合理设置与有序配合，政府应将部分公共资源用于乡村产业生计韧性培育方面，健全适应力导向的农民教育制度设计、部署适应力导向的农民教育行动，同

时强化适应力导向的农民教育经费、师资等“硬资源”的有效供给,以最大程度塑造与乡村产业生计韧性提升更相匹配的农民教育生态环境,释放农民教育驱动乡村产业生计韧性锻造的服务空间。

### (二) 聚焦变革力:促进教育主体观念调适以赋能乡村产业复元韧性理想锻造

风险冲击的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远远超出了乡村产业主体的直接感知能力与已有知识水平,以至于其能够独立施予的有效应对风险冲击的措施与策略非常有限且相对盲目。风险促成了乡村产业主体对专家系统的惯性依附,具有较为完备知识库与技术池的专家系统尽管有助于将各类未知、不可预见的风险挑战转变为可知晓、可解释的信息、资源及话语形式,使乡村产业在遭受风险冲击扰动时能通过采纳专家推荐方案、得到专家决策支持等方式,而较快获得自我恢复或达成新的稳定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专家系统本身也有局限性,对专家系统的惯性依附行为及其暗含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性也可能为乡村产业发展孕育出新的风险。再加上,专家系统本质是通过“一种知识的壁垒来主导决策”<sup>[45]</sup>,乡村产业主体对专家系统的惯性依附“实际上表明了其对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短缺”<sup>[40]</sup>。因此,在专家系统并非绝对有效、完美的情况下,要推动经由乡村产业变革力培育而促成复元韧性的真正生成与锻造,也必须同时依靠农民教育支持,旨在通过强化产业主体自身知识积累与技术提升,更理想地支撑起乡村产业的革新与复原。基于此,应教育引导乡村产业主体充分认识专家系统的有限性,端正自身参与相关农民教育及培训的动机取向,并将习得个人有效应对风险冲击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等视为参育参培的主要动力机制,旨在以此削弱“专家系统本身缺陷”带来的风险应对压力和“产业主体惯性依附行为”带来的可能性危害。另外,应推动专家系统与农民教育系统的职能互补与跨界协同,因为专家系统本身所具备的精准、高效、便捷与强时效性等特性,能有效弥补农民教育系统在实时指导、动态帮扶以及跟踪服务方面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而农民教育系统的知识传输、技术扩散等本体性功能也能在较大程度上破除专家系统对“专门知识的垄断”,使乡村产业主体自身成为有效应对风险冲击的重要力量。为此,理应践行

二者并重下的协同发力策略来驱动乡村产业复元韧性的生成锻造。

### (三) 注重竞争力:推动教育活动“在地化”以赋能乡村产业功能韧性深度拓展

乡村产业具有显著的乡土根植性,不可能剥离乡土社会而孤立地得到发展。一个具备市场竞争优势与区域比较优势的乡村产业应充分融合、嵌套地方乡土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生态等多元价值,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sup>[34]</sup>的发展态势。乡村价值带有空间属性,其能为地方产业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推动二者“在地化”连结而赋能乡村产业功能韧性深度拓展的农民教育,必然要完成自身发展的“在地化”转向,即通过深度挖掘与创新转化地方乡土价值体系的思维与方式,来直接参与或重点服务本土产业功能韧性的提升锻造工作。而农民教育的“在地化”转向需要相关的师资队伍来支撑,如此才能充分借力地方乡土价值、连结地方乡土文化、开发地方乡土资源,并将地方乡土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发展效益。为此,农民教育“在地化”转向的首要工作应重视对区域本土人才的开发与利用,通过将乡贤、乡村工匠、乡村教师、基层知识分子以及农村能人等长期扎根一方水土的优质乡土人才充实到农民教育师资队伍中,以“在地化”价值体系赋予乡村产业独特蕴涵,推动对乡村价值体系的创新运用,进而提升乡村产业竞争能力。另外,农民教育“在地化”应基于乡村价值体系统筹建设农民教育课程体系,以推动乡村价值体系以“在场”姿态深度融入乡村产业,赋予乡村价值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提升产业竞争力。具体而言,一是在课程理念架构上,树立“重新发现地方价值”的目标旨归;二是在课程内容选择上,主张在国家统一要求的内容基础上,因地制宜选择具有潜在经济价值与市场竞争优势的地方性知识、特色文化、生态资源、风俗文明等融入相关教育培训全程;三是在课程建构实施上,推动农民教育“在地化”课程从政策提倡走向乡村实践,由国家主导设计走向国家、地方及乡村产业主体共同参与建构的发展格局,以此增强农民教育课程的“在地化”内涵与乡土性色彩,提升乡村产业主体

打开视野用好当地资源并注重开发乡村产业新功能、新价值、新业态的创新能力,进而最大限度满足乡村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诉求及其功能韧性边界拓展需要。

#### (四) 激活发展力: 完善教育平台多元角色定位以赋能乡村产业过程韧性持续提升

基于关系网络推进不同层次与类型的资源要素实现从政社校企研等多元关系主体向乡村产业主体的常态化供给与持续性输送,是风险侵袭与冲击扰动下旨在通过激活产业自身发展力而增强产业过程韧性的最主要渠道。因此,农民教育应积极丰富、完善自身角色定位,实现从单一的教育教学平台向服务乡村产业主体“后天建构性”关系网络搭建的多元性平台转变。一方面,从现实看,在因农民教育交互平台构建形成的关系网络中,乡村产业主体并非仅仅是关系客体或服务对象,他们也是“网络中的乘数和‘织网人’”<sup>[46]</sup>,因为其本身在乡村产业生产经营与管理一线积累的防险、抗灾与避“坑”等经验性与实践性知识、反思性与本土化技术,同样也有助于扩充他人认知、增强其对风险冲击的应对与把握能力。为此,农民教育与培训要搭建好有助于乡村产业主体之间深度沟通与交流的服务型平台,如集中授课过程中组织学员开展洽谈会、分享会、圆桌论坛与沙龙活动,鼓励其围绕“乡村产业韧性提升”主题,坦诚讲述自己在产业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瓶颈和难题,主动复盘自己规避风险的经验和资源;集中授课结束后带领学员下到基地、走进园区,开展实地考察与游学互访,引导其在深度体验与实践研学过程中增进彼此间知识技术的碰撞与融合、信息资源的交互与流动以及情感行为的沟通与协同等,最大程度释放产业主体关系网络的“后天建构性”潜能。另一方面,农民教育还需注重乡村产业主体“后天建构性”关系网络的外生性延伸与拓展,旨在通过牵头共建产教融合基地、联合打造“云端”系列论坛、协同组织专家送教下乡送技上门、合力创设乡村课堂田间教室,以及共同开展农业文创集市活动、特色农产品品尝桌会等为乡村产业主体和政社校企研搭建点对点、面对面精准对接平台的方式,将多元行动者吸纳整合进关系网络中,并在此关系网络的支持下,为乡村产业过程韧性的培育注入更为系统、完整的“连结、

交换与规范”力量,形塑更为深远、多维的“安全空间”,以有效弥补乡村产业主体“先赋性关系网络”的有限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1] 李天祥, 万悦, 易福金. 全球百年大变局下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压力挑战与应对方案——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1 年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 135-143.
- [2]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发展报告 2022》正式发布[EB/OL]. (2022-11-21)[2023-02-28] <https://mp.weixin.qq.com/s/H1A9rkC3zlG67jKfhGHqtQ>
- [3] 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EB/OL]. (2021-11-09)[2023-1-17]. <https://cpc.people.com.cn/n1/2021/11/9/c64036-32286407.html>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 [2023-02-28]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5] 农民日报 中国农网评论员. 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N]. 农民日报, 2022-11-01(001).
- [6] 刘晓星, 张旭, 李守伟. 中国宏观经济韧性测度——基于系统性风险的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301(1): 12-32.
- [7] 郝爱民, 谭家银. 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及效应测度[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4): 1-20.
- [8] WALKER B, HOLLIN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Journal of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2): 56-63.
- [9] 郑涛, 杨如雪. 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J]. 技术经济, 2022, 41(2): 1-14.
- [10] JACOBI J, SCHNEIDER M, PILLCO MARISCAL M, et al. Farm resilience in organic and nonorganic cocoa farming systems in Alto Beni, Bolivi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2015, 39(7): 798-823.
- [11] 李胜会, 戎芳毅. 产业链现代化的渐进逻辑: 破解锁定与韧性提升[J]. 广东社会科学, 2022(5): 37-47.
- [12] 何亚莉, 杨肃昌. “双循环”场景下农业产业链韧性锻造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0): 78-89.
- [13] 蒋辉, 张驰, 蒋和平. 中国农业经济韧性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1): 20-32.
- [14] 郝爱民, 谭家银. 数字乡村建设对我国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3): 10-24.
- [15] 汤夺先, 陈艳. 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1): 120-129.
- [16] THEODOSIA ANTHOPOULOU, NIKOLAOS KABERIS, MICHAEL PETROU. Aspects and experiences of crisis in rural Greece, Narratives of rural resilie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8(52): 1-11.
- [17] RATHI A. Is agrarian resilience limited to agriculture? Investigating the "farm" and "non-farm" processes of agriculture resilience in the rural[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12(15): 23-27.
- [18] ASHKENAZY A, CHEBACH T C, KNICKEL K, et al. Operationalising resilience in farms and rural regions – Findings from fourteen case stud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7(8): 211-221.
- [19] GLAESER E L. Reinventing Boston: 1630-2003[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5, 5(2): 119-153.
- [20] BJØRKHAUG H, KNICKEL K. Rethinking the links between farm modernisati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9(18): 194-196.
- [21]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38.
- [22] 阚闯, 徐冰娜. “风险社会”的教育变革——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教育应对为例[J]. 教育研究, 2022, 43(3): 149-159.
- [23] 王建华. 高等教育适应论的省思[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35(8): 1-7.
- [24] 魏屹东. 论适应性表征及其方法论意义[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5(1): 21-31.
- [25] 王保华, 谷俊明. 职业教育适应性: 内涵、困境与发展理路——基于同步激励理论的分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2(11): 29-39.
- [26] 冯苑, 聂长飞, 张东. 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韧性的 shift-share 分解[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5): 60-72.
- [27] 吴孔明, 毛世平, 谢玲红, 等. 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基于产业安全视角[J].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24(01): 83-92.
- [2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41.
- [29] 朱启臻.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5(3): 89-95.
- [30]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新小农阶级: 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M]. 潘璐, 叶敬忠,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07.
- [31] 田真平, 高鹏.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和服务模式[J]. 教育与职业, 2021(9): 5-10.
- [32] 王杰, 曹兹纲. 韧性乡村建设: 概念内涵与逻辑进路[J]. 学术交流, 2021(1): 140-151.
- [33] 詹承豫, 高叶, 徐明婧. 系统韧性: 一个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理念[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4): 17-32.
- [34]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EB/OL]. (2023-03-15)[2023-03-15]http://www.gov.cn/xinwen/2023-03/15/content\_5746861.htm
- [35] 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方能国强[N]. 人民日报, 2023-02-16(002).
- [36] 再降就没得钱了! 扶贫火龙果为何从每斤 15 元跌到两三块[EB/OL]. (2018-07-27)[2023-04-0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7100049335114399&wfr=spider&for=pc
- [37]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24.
- [38] 吴越菲. 从部门生产到区域繁荣: 面向农村新内生发展的政策转型及其反思[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5): 158-168.
- [39] 米丹. 风险社会与反思性科技价值体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67.
- [40] 杨雪冬. 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32.
- [41] 温铁军. 激活乡村百万亿生态资产价值[EB/OL]. (2021-12-08)[2022-07-21]https://xw.qq.com/cmsid/20211208A08EZ700
- [42] 罗兴佐, 刘天文. 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源与地方市场[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104-113.
- [43]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EB/OL]. (2021-11-03)[2023-02-28]https://www.xuexi.cn/lpage/detail/index.html?id=15418475108578163234
- [44] 尹成杰.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风险防控体系[EB/OL]. (2022-12-02)[2023-02-28]https://mp.weixin.qq.com/s/gQaNr7WxmJOk0wj524KQaw
- [45] 李瑞昌. 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263.
- [46] GEUN LEE, NADIR AYHAN. Why do we need non-state actors in public diplomac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relational, networked and collaborative public diplomac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17, 22(1): 186-198.

责任编辑: 曾凡盛